

明代书坊与词集传播

张 仲 谋

词的传播方式,南宋以后有一大变化,即唐宋时期主要靠歌妓乐工以及民间的口头传唱,其后随着音乐性的淡化与文学性的增强,尤其是元曲、南北曲以及明清时调的先后代兴,词逐渐由乐歌变为一种新的格律诗,其传播也就以纸质媒介为主了。在这一过程中,书坊与出版商的作用甚大。叶德辉曾经说过:“书籍自唐时镂板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①词之一体,长期被视为小道末技,非经非史,故官刻本极少。然而词无论是在市井传唱的晚唐两宋时代,还是在一般文人普遍薰习的中晚明时期,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词集的刊刻也就有了社会需求与商业价值。据文献记载,南宋时词集的四大丛刊,差不多都是由书坊刊行的。已知《百家词》为嘉定初长沙刘氏书坊刊行,《琴趣外编》为南宋中叶闽中书肆刊行,《典雅词》为南宋后期钱塘陈氏书棚刊行。只有《六十家词》具体刊刻情况不详。其他如《类分乐章》20卷,《群公诗余前后编》22卷,《五十大曲》16卷,《万曲类编》10卷等等,这些《直斋书录解題》卷二十一著录的词集,陈振孙已明确指出“皆书坊編集者”^②。词集既由传唱之歌本变为商品,词集本身及其刊行、流通过程也就弥漫着愈来愈浓的商业味。我们看晚唐至北宋的词选,如《云谣集》、《花间集》、《遏云集》、《家宴集》、《尊前集》、《金奁集》、《兰畹集》等,往往带有应歌的或女性的本色意味。可是再看南宋后期的词选,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绝妙好词》、《阳春白雪》等等,一听书名就带有书商鼓吹招徕的广告意味。这些当然并非“书坊編集者”,而文人或词人编者为了所编选本的传播普及,自会去应和乃至迎合商业体制的诉求。至于后起的《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本来就是书坊編集者,而书名中张扬夸饰的前八个字,更具有浓重的广告意味。然而也正是这个出于坊间的选本,在元明时代风行了三百年之久。

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首《自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一、明代坊刻词集的兴盛

明代是一个出版业繁盛的时代,明代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样式的繁荣与出版业的支撑与刺激大有关系,介于雅俗文学之间的词的流行也与此大有关系。戚福康称明代为“书坊的成熟期”^①。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著录明代书坊 253 家,而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则著录有 400 多家。一方面可以说是广大民众对通俗文学的消费诉求刺激了出版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书坊的繁荣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两者互为因果。

从时间先后来看,明代书坊的繁荣主要在嘉靖至明末大约一百餘年的时间,而这个时段恰好与明代词学的复苏同步。戚福康指出:“自朱元璋开国的洪武时代起至崇祯年间,书坊的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总体来说,从书坊生产的逐渐恢复而达到它的最高水平有一个时间过程,因而真正成熟的阶段主要指嘉靖至明末。”^②程国赋亦云:“明代书坊的小说刊刻是相当集中的,从文体来看,除少量文言小说以外,绝大多数是通俗小说;从刊刻时间来看,主要集中于自嘉靖元年(1522)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 122 年之间,尤其集中在万历中后期至崇祯末,小说的刊刻活动十分活跃;从刊刻的地区来看,形成建阳、南京、苏州、杭州等几大小说刊刻中心。”^③程国赋考察的重点当然是小说,但这里所指出的坊刻小说繁荣的时间(嘉靖至明末,尤其是万历至明末),繁荣的地域(建阳、南京、苏州、杭州),和明代出版业繁盛的时空是完全相合的。也就是说,这种判断对于通俗小说、戏曲、日用类书以及其他通俗文学都同样适用。当我们以明代词籍的刊行为考察对象时,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而这种现象是耐人寻味的。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推论。其一,明代后期大量词籍的刊行,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词学的复苏,但它显然不单单是词之一体的复兴,而是整个文化空前普及的必然结果。其二,明词的复苏,是与通俗小说、戏曲的繁荣同步的,甚至可以说是与整个通俗文学的繁荣同步的。这表明词从敦煌曲子词时代的胡夷里巷之曲,到两宋时代出落成典雅精致的文人词,而到明代又出现了向俗文学回归的态势。

参考王兆鹏先生《词学史科学》等著作已知明代词选由书坊刊行的至少有 40 余种(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分别统计)。具体见下表:

①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40 页。

②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第 161 页。

③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 年,第 7 页。

序号	年 代	词 选	书坊
1	洪武二十五年(1392)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餘四卷	遵正书堂
2	成化十六年(1480)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餘四卷	刘氏日新书堂
3	正德十六年(1521)	花间集十卷	吴郡陆元大
4	嘉靖十六年(1537)	新刊古今名贤草堂诗餘六卷	三衢童子山
5	万历八年(1580)	花间集十二卷补遗二卷音释二卷	茅氏凌霞山房
6	万历十二年(1584)	类编草堂诗餘四卷	书林张东川
7	万历十三年(1585)	诗餘选四卷	金陵书林吴桂崇文枢堂
8	万历十六年(1588)	重刻类编草堂诗餘评林六卷	书林勉斋詹圣学
9	万历二十三年(1595)	重刻注释草堂诗餘评林六卷	书林郑世豪宗文书堂
10	万历二十九年	草堂诗餘八卷	西陵来行学
11	万历三十年(1602)	新锓订正评注便读草堂诗餘七卷	乔山书舍
12	万历三十年(1602)	新刻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餘二卷	余氏沧泉堂
13	万历三十年(1602)	花间集十卷集补二卷	玄览斋
14	万历三十六年(1608)	新刻注释草堂诗餘评林六卷	起秀堂
15	万历四十三年(1615)	新刻题评名贤词话草堂诗餘六卷	书林自新斋余文杰
16	万历四十七年(1619)	新刻李于麟先生批评注释草堂诗餘隽四卷	萧少衢师俭堂
17	万历四十八年(1620)	花间集四卷	吴兴闵瑛璧
18	万历四十八年(1620)	草堂诗餘五卷	吴兴闵瑛璧
19	万历四十八年(1620)	词的四卷	吴兴闵瑛璧
20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四家宫词二卷	吴兴闵瑛璧
21	万历年间	新刻分类注释草堂诗餘六卷	李良臣东壁轩
22	万历年间	类编草堂诗餘四卷	致和堂
23	万历年间	唐宋元明酒词二卷	金陵荆山书堂
24	万历年间	花间集十卷集补二卷	吴勉学师古斋
25	天启四年(1624)	花间集二卷	钟人杰读书堂
26	天启五年(1625)	新锓朱批注释草堂诗餘评林四卷	周文耀
27	崇祯四年(1637)	词菁二卷	陆云龙崢霄馆
28	崇祯十年(1637)	古今诗餘醉十五卷	胡氏十竹斋
29	崇祯十二年(1639)	精选名儒草堂诗餘三卷	叶氏朴学斋
30	崇祯年间	古香岑草堂诗餘四集十七卷	南城翁少麓
31	崇祯年间	古香岑草堂诗餘四集十七卷	吴门童涌泉
32	崇祯年间	古香岑草堂诗餘四集十七卷	吴门万贤楼
33	崇祯年间	花间集二卷	雪艳亭

34	崇祯年间	梅苑十卷	毛氏汲古阁
35	崇祯年间	尊前集二卷	毛氏汲古阁
36	崇祯年间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	毛氏汲古阁
37	崇祯年间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	毛氏汲古阁
38	崇祯年间	类编草堂诗余四卷	毛氏汲古阁
39	崇祯年间	词林万选四卷	毛氏汲古阁
40	年代不详	新刊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二卷	慎节堂
41	年代不详	类编草堂诗余四卷	古吴博雅堂

以上所列,可能还只是一个不太完备的清单,但明代书坊在词选刊行方面所花的功夫,借此已可见一斑了。

和明代出版事业的繁荣相适应,明代的出版商也表现得相当活跃。他们往往不是消极地、被动地等待书稿上门,而是从后台走向前台,主动策划,主动合作,这里可以举晚明时颇为活跃的出版商翁元泰为例。

元泰字少麓,以字行,江西南城人,万历间来苏州开设霏玉楼书坊。在晚明出版商中,我们常看到的不是“霏玉楼书坊”,而是“南城翁少麓”。所谓南城并不是指苏州的城南街区,而是江西省东部的一个县。翁少麓和不少文人有着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草堂诗余三集》的编者钱允治和笺释者陈仁锡,都与他有过多次合作。在翁少麓刊行的书中,如《新镌增订评注批点便蒙通鉴》八卷,为钱允治评注;李时珍《食物本草》二十二卷,卷首有钱允治天启元年(1621)序;《名世文案》三十卷,为胡时化辑,陈仁锡订;《四书备忘》,为陈仁锡增订。因为书坊比文人有着更强的商业敏感,所以有不少书的編集都是出版商策划的,文人不过是他实现设想的雇佣者而已。钱允治《合刻类编笺释草堂诗余序》中写道:

先刻《草堂诗余》,无如云间顾汝所家藏宋本为佳,继坊间有分类注释本,又有毘陵长湖外史《续集》本,咸鬻于书肆,而于国朝未遑也。惟注释本脱落谬误,至不可句。太末翁元泰见而病之,博求诸刻,愈多愈谬。乃倩余任校讐之役。又命余搜葺国朝名人之作,并毘陵《续集》,尽加注释,凡三编焉。^①

从这一段话可知,“倩”钱允治重校《类编草堂诗余》的是翁元泰,“命”钱允治搜葺編集《国朝诗余》,以及连同毘陵长湖外史所编《草堂诗余续集》“尽加注释”的也是翁元泰。其实翁元泰既不是词人,也不是词学爱好者,他愿意雇佣钱允治、陈仁锡来校订注释诸种词集,当然不是出于某种文化使命感,而是为了出书赚钱。

^① 《类选笺释草堂诗余》《类选笺释续选草堂诗余》《类编笺释国朝诗余》,《续修四库全书》本。

《合刻类编笺释草堂诗餘》三种,刊行于万历四十二年(1613),大约十餘年后,沈际飞又在此基础上改编新集,增辑别集,从而推出了面目一新的《古香岑草堂诗餘四集》。而在沈际飞撰写的《古香岑草堂诗餘四集》卷首的“发凡·诫翻”条中写道“太末翁少麓氏,志趋风雅,敦恳兹集,捐重货精镌行世”云云,可知这套踵事增华的四集系列,也还是翁少麓“敦恳”的结果。

二、明代坊刻词选的缺点

因为书坊主必然以追逐利润为目的,所以坊刻词集的缺点是相当明显的。

缺点之一,编刊质量不高。就众多选本而言,质量高低当然是相对的,但如果把书坊编刊的词选与词家编刊的词选作比较,质量高低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所说的质量,包括选、编、刊、校四个层次。所谓“选”,是指词作的选择。选哪些词,不选哪些词,既反映编者的水平功力,也能见出编者的词学见解。试看宋代或清代那些出于词学家之手的词选,无不有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即使偏主婉约或过分求雅,词选背后总有思想内涵。而书坊编集的词选,根本的问题在于不懂词,无想法;无想法还要做成一部“新”的选本,就只好胡乱做些改变,如卷数的合并与拆分,词作增几首减几首,加上一点不着痛痒的注释或评点,拉上一两位名人等等,无非这些招数。这是为变而变,在编者来说并没有自己的想法。所谓“编”,指词选编排的体例。体例当然只有按人编排、按类编排与按调编排等数种,然而这里也有质量问题。如词人题署用名、字、号的问题,本来应该是临文不讳,一律称名,但历来选本尤其是明代选本好像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总是名、字、号混用。又如按调编排,在同调异名问题上也总有前后重出等问题。至于分类编排,如何根据词的艺术个性作别致的分类,而不是照搬类书或诗选、文选的分类,也是大有斟酌的。所谓“刊”指的是版刻水平。坊间为了规模数量,在雕板印刷方面也会偷工减料。所谓“校”,就是文字校核。坊刻书籍,在这一点上历来倍受诟病。朱彝尊《书花间集后》就曾说过:“坊板讹字最多,至不能句读。”^①明词选本中,吴从先编刊的《草堂诗餘集》版刻差劣,讹误满纸,历来最遭诟病。如把词人丁仙现误为下先观,辛幼安误为新幼安之类,俯拾即是。

当然,这里说明代书坊编刊的词选质量不高,只是就总体情况而言。若是就具体词选来说,则亦有编辑谨严者,有刊刻精美者。如正德间陆元大刻《花间集》,万历间闵映璧朱墨套印本《评点草堂诗餘》,都是较为精美的。

缺点之二,翻刻之弊严重。明代后期所刻书“牌记”中,往往有“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之类警示语。如《大明万历七年岁己卯大统历》牌记:“钦天监奏准印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又如明万历刻本《月露音》牌记云:“杭州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又明万历三十一年刻《前唐十二

^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家诗》牌记曰：“闽城琅環斋版，坊间不许重刻。”^①对于坊间翻刻之弊更加深恶痛绝的是沈际飞，其《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卷首“发凡”中有一条，曰“诫翻”，其中写道：“坊人嗜利更惜费，翻刻之弊，所由始也。迩来诟告追板，而急于窃其实，巧于掩其名。如《诗馀》旧本按字数多寡编次，今以春、夏、秋、冬编次矣，至本意、送别、题情、咏物诸词，尽不可以时序论，必硬入时序中，不妥莫甚。太末翁少麓氏，志趋风雅，敦恳兹集，捐重资精镌行世，吾惧夫后来市肆，有以春、夏、秋、冬故局刻之者。不然，以四集合编，稍增损评注刻之者，而能逃于翻之一字乎？夫抹倒阅者一片苦心，为不仁，罥吞刻者十分生计，为不义，诟默默而已也！先此布告。”^②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则重要文献，它表明国人版权意识淡薄，盗版盛行，竟是如此的由来已久！为了避免诟告追板，打版权官司，出版商往往会采取一些成本不大的改动措施，如卷帙的分合，篇目的增减，以及编排体例之变化等等，这些在《草堂诗馀》系列的孳生衍化中，早已是变尽花样了。沈际飞“诫翻”一条，实际不是针对其书内容体例之说明，而是一个诫示翻刻者的版权声明。

缺点之三，依托名人。出版商最熟悉名人效应，所以历代书坊主都会依傍名人，只不过明代书坊做得更出格、更邪乎而已。明代书坊刻行的词选，往往会搬出一些大名头的人物做招牌。如李攀龙、杨慎、唐顺之、李廷机、董其昌、陈继儒等人，都是书坊屡屡光顾的“事主”。虽然说书坊狡黠，真伪莫辨，这里仍然想举出数例来拆穿其把戏。

1. 托名杨慎。如天启四年（1624）钟人杰重编、读书堂刊《花间集》二卷。题“杨慎选并评注，钟人杰笺”。从版本源流来看，此本之祖本为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晁谦之建康郡斋刻本《花间集》十卷。明正德十六年（1521），吴郡陆元大翻刻晁谦之本。明万历八年，有茅氏凌霞山房刻本“《花间集》十二卷附补遗二卷音释二卷”，题“后蜀赵崇祚编，明温博补录，明茅一桢音释”。此本以陆元大本为底本，补录李白、张志和、元结、刘禹锡、李涉、王建、白居易、薛能、徐昌图、刘燕哥、无名氏、李璟、李煜、冯延巳等14家词71首。另加茅一桢音释二卷。钟人杰重编的《花间集》二卷，是在茅本基础上的改编本。该集删去花间词108首，于茅本补录14家中删去元结、徐昌图、薛能及无名氏4家，删去李煜4首词，共保留74调443首词，按词调字数长短分为二卷。此本相对于《花间集》原本改动较大。一是删去了花间词108首，二是增加了李白、张志和等11位唐五代词人，三是把按人编排改为分调编排。然而不管钟人杰如何改动，他都是在茅氏凌霞山房刻本基础上改编的。就是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认定，杨慎不可能参与该书的选评工作。这是因为杨慎卒于嘉靖二十八年（1559），所以他不可能在万历八年（1580）刻行的茅本基础上去选、去评、去注。钟人杰伪托杨慎之名，于此可得证实。

①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6页。

②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卷首，明崇祯间吴门童涌泉刊本。

2.托名唐顺之。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人称荆川先生,武进(今属江苏)人。因为推崇唐宋古文,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在嘉靖时期文坛上有较高的知名度,所以也成为书坊主依傍的名家之一。在《草堂诗馀》系列刊本中,伪托唐顺之名义者至少有两种。一为明万历十二年(1584)书林张东川刻《类编草堂诗馀》四卷,题“唐顺之解注”;一为万历十六年(1588)勉斋詹圣学刊本《重刻类编草堂诗馀评林》六卷,题“唐顺之解注,田一隼精选,李廷机批评”。唐顺之不长于词,故《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中均无其作,其著作中亦从不谈词,所以不大可能去参与坊刻词选的编撰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唐顺之去世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当然不可能为身后二十余年才刊行的《草堂诗馀》作注。反过来说,假使他在世时确曾参与了这样的工作,那么以他的名声,嘉靖时期的出版商早就会视若拱壁抢先出版了,决不会等到二十余年之后。后一种书即詹圣学刊本,伪托更大胆,破绽也更明显。这里挂了三块大牌子,现在的人也许只知道唐顺之,而不知道后二位是何方神圣,但对当时的读者来说,这三位都是大名头。他们都有一种特殊的身份,即唐顺之是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名,即会元,而田一隼是隆庆二年(1568)的会元,李廷机是万历十一年(1583)的会元,把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就仿佛带有“连中三元”的祝福或喜庆意味,这从出版营销心理来说,讨好读者的动机是很明显的。然而这三位名人时代不同,当然不可能合作。唐顺之去世时,李廷机才18岁,田一隼也要到八年之后才会元;而在没中会元之前,他们的名字是没有号召力也没有商业价值的。而到李廷机万历十一年中会元时,唐顺之早已去世20余年了。因此,要让这三位会元合作完成一本小书,不要说他们不屑,他们即使想合作也没有可能性。

3.托名李廷机。李廷机(1542-1616),字尔张,号九我,福建晋江人。隆庆四年(1570)举顺天乡试解元,万历十一年会元、榜眼。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卒谥文节。著述有《四书臆说》、《春秋讲章》、《通鉴节要》、《李文节文集》等。无论是看《明史》本传,还是看《李文节文集》,李廷机都是一个正统的官僚文人。他在民间尤其在故乡福建的影响,一方面因为他是会元、榜眼,并且做到主政阁老,另一方面还在于那些关于他的传闻。他上给万历皇帝的辞呈多达123次,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创纪录的。在崇尚淡泊清廉的中国,李廷机这种不恋官职的形象是很得人心的。一直到现在,福建一些学校的德育教材中还有关于李廷机屡上辞呈的美谈。李廷机既不写词,《李文节文集》中更几乎全是应用性文牍,没有多少文学意味。明代书坊刊刻词集之所以硬要扯上他的名字,大概和他在社会民众中的良好口碑有关。明代题称李廷机批评的《草堂诗馀》系列刊本多达7种。除了前面提到的勉斋詹圣学刊《重刻类编草堂诗馀评林》六卷之外,还有李良臣东壁轩刊《新刻分类评释草堂诗馀》六卷,题“李廷机评释”;万历三十二年(1604)书林郑世豪宗文书堂刊《新刻注释草堂诗馀评林》六卷,题“李廷机评解”。这三家书肆,詹圣学与郑世豪二家在建阳,李良

臣在汀州,和李廷机均为福建同乡。其后又有万历三十六年(1608)起秀堂刊《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六卷,题“李廷机评解”;万历间刻本《新镌李太史注释草堂诗余旁训评林》六卷,题“李廷机批评”;天启五年(1625)周文耀刻朱墨套印本《新镌朱批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四卷,题“李廷机批评”。所有这些,和其他坊间托名李廷机编纂的杂书一样,都是靠不住的。

4.托名陈继儒。陈继儒是晚明时期游走于雅俗文学之间的大名士,所以被托名的现象也尤其突出。在小说戏曲评点方面,或可说真伪参半,而在词集评点方面则差不多都是出于伪托。如《古今词统》本为卓人月、徐士俊合编,卓人月、徐士俊、孟称舜诸序言之凿凿,而后来翻印者不仅把书名改为《草堂诗余》,并在“卓人月选、徐士俊参评”之上,剽加“陈继儒眉公评选”一行,赵万里《古今词统十六卷跋》已明确指出此本“不足据”^①。又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南城翁少麓校刊《类选笺释草堂诗余》正集六卷、《续选草堂诗余》二卷、《类选笺释国朝诗余》五卷(即三集合订本),书前题“刻陈眉公重校注释正续草堂诗余,附钱功甫订正注释国朝名家诗余选,南城翁少麓原版”。据此则正集、续集的校对、注释均为陈继儒(眉公)所作,而据前引钱允治《合刻类编笺释草堂诗余序》来看,正集校雠是他做的,续集注释也是他做的,《国朝诗余》当然更是他编的,应该没有陈继儒什么事。假如陈继儒真的参与了此事,钱允治的序还会这么写吗?这里委托钱允治编校诸集的翁元泰,就是在金阊开设霏玉楼书坊的翁少麓,他只顾上攀附名家,不想钱允治在序中实话实说,于是陈眉公这茬儿就全搭不上了。

5.托名李攀龙。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草堂诗余》系列刊本中,托名李攀龙的有二种。一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书林自新斋余文杰刊《新刻题评名贤词话草堂诗余》六卷,卷端题“济南于鳞李攀龙补遗,四明眉公陈继儒校正,书林泰垣余文杰绣梓”。这是明显的伪托。一方面是余文杰刊本出于万历二十三年郑世豪刊本,两书基本相同,故无所谓“补遗”。另一方面,当此书刊行时,李攀龙已去世45年之久了。即使是郑世豪刊本问世时,李攀龙也已去世20馀年了。另外一种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师俭堂萧少衢刻《新刻李于麟先生批评注释草堂诗余集》四卷。卷端署“古歙吴从先宁野甫汇编,公安袁宏道中郎甫增订,仁和何伟然欲仙甫参校”。此书出自余文杰刊本,不过卷帙分合有异。前书既为伪托,此书更是伪上加伪。吴从先拉上他的朋友何伟然(字欲仙,一字仙郎)参校是可能的,拉上不写词又已去世九年的袁宏道,当然也是伪托。

三、明代坊刻词选的贡献

不管坊刻词集有多少缺点,利害相权,其贡献还是主要的。

^①蒋哲伦、杨万里:《唐宋词书录》,岳麓书社,2007年,第86页。

明代坊刻词选的一大功绩,就是通过众多选本的大量刊行,促进了词的传播与普及,从而为词的复兴提供了条件与环境。这种普及工作,本来是应该由词学家来做的。我们看宋代的词选,尤其是清代的词选,大多出于词人或词学家之手。宋代如曾慥编《乐府雅词》,黄昇编《花庵词选》,周密编《绝妙好词》,这些流传下来的著名词选,皆出于词人或词学家之手。在词学大盛的清代,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如邹祗谟、王士禛编《倚声初集》,陈维崧等人编《今词苑》,顾贞观、纳兰性德编《今词初集》,朱彝尊、汪森编《词综》,蒋景祁编《瑶华集》,一直到晚清陈廷焯编《词则》,朱孝臧编《宋词三百首》,词学家仿佛把编集词选当成了一项事业,当成了一种自觉担承的使命。与前面的宋代和后面的清代相比,明代的词人或词学家对词选的编集表现得较为淡漠,用当下流行话语来说,可以说是“缺位”或“不作为”。当然,我们记得明代中期的词学家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尝试。陈霆编过一部《草堂遗音》,但这部以宋词为审美标准的词选没有流传下来。张綖遵师嘱编过一本《草堂诗餘别录》,但这部微型词选只选了“平和高丽之调”78首,比张惠言《词选》所录篇什还要少,这或者说只能是一种研究工作,不可能成为面向大众的普及之本。好大喜功的杨慎编过好几部词选,但他贪多求快,又只顾自说自话,所编词选往往沦为其《词品》的注脚,完全不考虑一般读者的需求,所以如《词林万选》、《百琲明珠》,虽然流传下来了,皆非佳选。否则以杨慎的词坛誉望,他所编的词选本来最有资格成为畅销书;而事实上在明代后期的图书市场上,这种书还不如书坊编集者更有竞争力。其他如陆深、夏言、陈铎、王世贞、俞彦、董斯张等,均具备选编一部好的词选的条件与功力,可是他们都对此表现淡漠。所以除了陈耀文、沈际飞、卓人月等在选词方面较为用心之外,就整体而言,明代词学家在选词方面投入精力不多,取得成绩不大。如果说在明代文坛上主流文学家已失去了掌控能力的话,那么对于词坛来说,词人或词学家可以说是在抛撇责任的同时,把词的筛选、编集、传播的权力也拱手让给民间书坊了。

如前所说,明代书坊编刊的词选多数质量不高,但对于一般读者或词学爱好者来说,能够通过一部篇幅不太大的选本,看到宋代或历代的名家名篇,这就不错了。我们看《全明词》和《全明词补编》,明词作者约2000人,其中约有五分之四的词人分布在嘉靖之后尤其是万历元年之后。不管是爱好词的人多了所以拉动了词选类图书的市场,还是大量的词选流通培育了新生代的词人,总之,晚明时期词的复兴应与词选的大量发行不无关系。可能多数学习填词的人水平不高,但大量的词学爱好者会形成一种环境与氛围,而这种环境与氛围正是孕育大词人的必要条件。论者总喜欢称道清初词坛的崛起与繁荣,而这种崛起乃是先有了词的全面普及的基础,然后赶上明清易代的刺激才形成的。